草地副刊 百家谭

无心插柳柳成荫

课文忆写之三：《青山不老》

梁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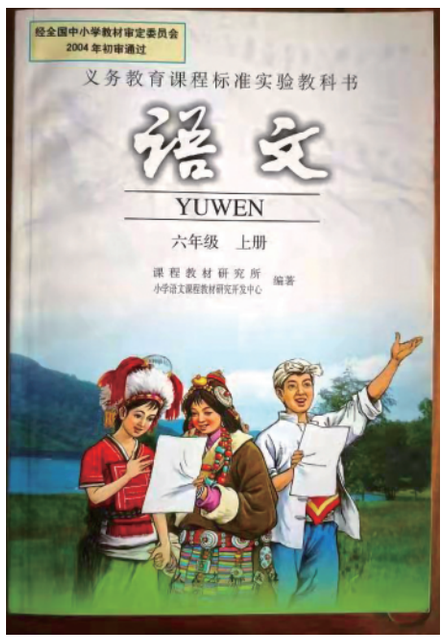
《青山不老》一文被选入课本，经常有教学部门来问相关经过。其实，这是一个偶然，是一篇拐了几道弯之后的无心插柳之作。它经历了一个从新闻稿到文学稿，又到课文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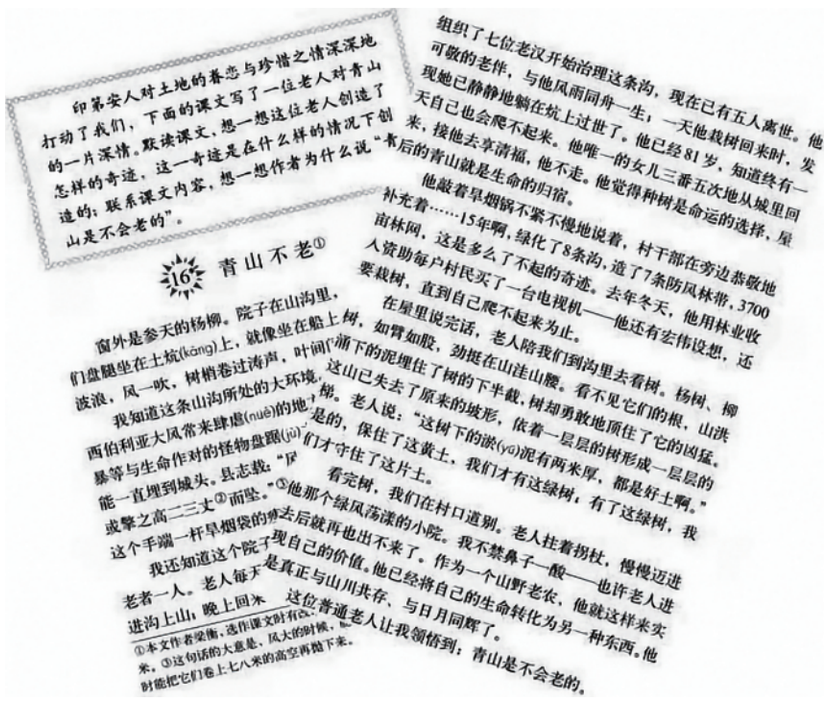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作为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在山西驻站。山西的北部向为风沙肆虐之地，不但山西，整个华北、西北一线沙漠连着沙漠，对我国北方的农业和生态构成重大威胁。在山西当记者之前，我已在内蒙古工作6年，对风沙之害有切肤之痛。黄河每年要从上、中游带走泥沙16亿吨入海。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，一直是华北、西北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头等大事，也是我在采访中特别关注的话题。

1983年夏，我在晋北神池县采访到一件事。一个叫高富的农民，在16年前组织了7个平均年龄65岁的人，成立了一支老年植树队，防风治沙，共打起36座坝，绿化了8条沟，为集体创造了惊人的财富，只一次间伐的树就为全村每家买了一台电视机。最让我激动的是他平和的态度，觉得种树像吃饭一样是最自然的事。我去时植树队里已有5人去世，一人生病，只有他还在坚持种树。他的老伴也已去世，小院里就剩下他孤身一人，还有一副准备好的棺材。他坦然面对生死，说种到哪一天爬不动了，躺进去就是。我很激动，但是苦于没有写稿的由头。这样普通的劳动者在晋西北太多了。于是就给县委出了一个主意，你们应该给老人立一块碑，为他这个集体立一块碑。16年的事，已不是新闻，但立碑就是新闻，就能带出16年来的事迹。我在基层当记者多年，经常苦于那些可爱的普通劳动者、无名英雄不能见报，而地方领导又不善于宣传鼓动工作，我就常给他们找切入点，“拔苗助长”，打通走向版面的最后一公里。有一年在吕梁山区，一位教书几十年的山区教师默默无闻，我建议县委授予他“山区办学英雄”，然后见报。我当时对自己的职业要求是：“为无名者立传，为隐身者传名”。这一次神池县委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为高富立碑。常委会一通过决定，我即发了这篇新闻稿《（肩题）神池县将立造林功臣碑；（主题）表彰高富育林十六载，一心为村里乡亲造福》。《光明日报》1983年7月24日见报。大家注意这个“将”字，这是一条预见性新闻，可知记者的良苦用心。本来高富栽树和记者写稿，这都是各自生活中最普通的事情。事情过去就过去了。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，新闻是易碎品。

1987年我调离新闻采访一线，到新闻出版署工作。回首9年的基层记者工作，整理了一本研究性小册子，书名《没有新闻的角落》，讲怎样采访、写稿。其中收了这篇高富造林的消息，并配了一篇写作体会《无尽的敬仰》。我敬仰他朴实、敬业、牺牲的精神。尤其是他手持旱烟袋、谈笑说棺材的镜头，我永不能忘。1990年7月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，其时距当年消息见报已经过去了7年。这本谈新闻业务的书发行量很大，后来人民出版社、新华出版社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都有再版，成了新闻入门的必读书。共印了多少，已无法统计。令人不解的是，这样一本新闻业务书怎么会传到教育部门，引起教材编写人员的注意。而且用的并不是那篇新闻稿，而是那篇谈写稿体会的文章。

虽是体会文章，但我是当作散文写的。新闻与文学的最大区别是：新闻说事，文学说人；新闻是事学，文学是人学；新闻里也说人，但是以事带出来的人；文学里也说事，但是以人带出来的事。我的这篇体会已甩开新闻事件重点谈高富的人格美了，而且按照我的“文章五诀”写作理论，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，一样不少，是一篇标准的散文。





16 青山不老①

窗外是参天的杨柳。院子在山沟里，我们盘腿坐在土炕(kàng)上，就像坐在船上树，如臂如股，劲挺在山洼山麓。看不见它们的根，山洪波浪，风一吹，树梢卷过涛声，叶间筛下的泥埋住了树的下半截，树劫勇敢地顶住了它的凶猛。

我知道这条山沟所处的大环境，这山已失去了原来的坡形，依着一层层的树形成一层层的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(nüè)的地方。是的，保住了这黄土，我们才有这绿树，有了这绿树，我们才守住了这片土。

暴等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盘踞(jù)，看完树，我们在村口道别。老人拄着拐杖，慢慢迈进能一直埋到城头。县志载：“戾气……”②而坠。”③他那个绿风荡漾的小院。我不禁鼻子一酸——也许老人进或擎之高二三丈④而坠。”这个手端一杆旱烟袋的疹去后就再也出不来了。作为一个山野老农，他就这样来实

我还知道这个院子现自己的价值。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种东西。他老者一人。老人每天是真正与山川共存、与日月同辉了。

进沟上山，晚上回来。这位普通老人让我领悟到：青山是不会老的。

①本文作者梁衡，选作课文时有改。②这句话的大意是，风大的时候，……来。③这句话的大意是，风大的时候，……时能把它们卷上七八米的高空再摔下来。

印第安人对土地的眷恋与珍惜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们，下面的课文写了一位老人对青山的一片深情。默读课文，想一想这位老人创造了怎样的奇迹，这一奇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造的。联系课文内容，想一想作者为什么说“本后的青山就是生命的归宿。

他觉得种树是命运的选择，星山是不会老的”。

补充着……15年啊，绿化了8条沟，造了7条防风林带，3700亩林网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。去年冬天，他用林业收入资助每户村民买了一台电视机——他还有宏伟设想，还要栽树，直到自己爬不起来为止。

在星里说完话，老人陪我们到沟里去看树。杨树、柳

组织了七位老汉开始治理这条沟，现在已有五人离世。他可敬的老伴，与他风雨同舟一生；一天他栽树回来时，发现她已静静地躺在炕上过世了。他已经81岁，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也会爬不起来。他唯一的女儿三番五次地从城里回来，接他去享清福，他不走。他觉得种树是命运的选择，星

·2· 光明日报 1983.7.24

神池县将立造林功臣碑

表彰高富育林十六载

一心为村里乡亲造福

高富所在的八角大队植树七千余亩，用林业收入资助每户买一台电视机

本报讯 记者梁衡、通讯员冯耀报道：在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晋西北革命根据地——这块曾为无数革命先烈立有纪念碑的土地上，如今又将为一位活着的不倦的建设者立一块“造林功臣碑”。这项决定是最近中共山西省神池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联合作出的。

这位功臣名叫高富，今年八十一岁，是神池县八角大队的一位普通社员。八角大队，历史上风大沙多，灾害频繁。原其县志载：“风大作时，能逆吹牛马，徒例行，或拿之高二、三丈而坠。”这里，年年因沙害损苗，长期低产，水土流失严重。一九六七年，正当“文化大革命”动乱开始不久，当时年已六十五岁的高富，组织了七位平均年龄七十一岁半的老汉，开始了村南的一条没有人烟的荒沟，开始打坝拦洪植树造林。两年后，一条乱石滚滚的荒沟长满了杨柳。他们的举动感动了村里的乡亲，后来虽然五位老人先后去世，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报名参加高富的植树队。经过十六年来的艰苦劳动，这个大队共打起了三十六座土坝和八百余土埂，在石滩上修起了二米多厚的铁土，绿化了八条沟和七华里公路，营造了离五十来的七条防风林带，建起了三千七百亩林网方格田，成片造林面积达七千一百六十三亩，零星植树七万一千株。过去光秃秃的沙坠、乱石滚滚的荒沟，现已长满奇抱粗的杨柳树。据有关部门测算，这个大队现在的木材积蓄量共有六千八百多立方，总值达一百三十多万元，全村人均九百元。现在这一笔绿色财富已开始为村民造福。实行责任制后，光间伐下的木材便满足了全村家家户户搭牛棚、猪圈、做车辆之用。去年冬天，大队又从林业收入中拿出五万七千多元，资助全村社员每户买一台电视机，目前已运回二百三十多台。到今年秋天，这里将成为一个户户有电视的电视村。

由于植树造林，现在全村已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，改善了小气候和生态平衡，粮食油料产量和十六年前比分别提高了一点一倍和十七倍。

高富老人植树治沟的经验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，中央、省、地的林业、水保部门现正在总结推广。

高富老人无子，老伴早已去世。他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工作，要接他出去安度晚年。他说：“我离不开这些树。”现在他每天天一亮就拄着拐杖到林子里看树，指导青年人种树护树。村里社员都尊敬地称他高富大爷，无论大人孩子，都称这满山满沟的树为“高富大爷的树”。大家自觉爱护，几年来无一偷砍盗伐。党和政府对高富给予很高的荣誉，他作为林业劳模，曾七次出席全省劳模大会；去年，全县又造他为特等劳模。几来这里下乡的省地县的领导同志，都要来看望他，并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。

“造林功臣”高富 冯耀报

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文学稿变成课文稿时砍掉了文章开头最感人的一段：

《三国演义》上有一个故事，写庞德与关羽决战，身后抬着一具棺材，以示此行你死我活。就是我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埋了就是，真一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。这种气概大约只有战争中才能表现出来，只有在书本上才能见到。但是当我在一个小山沟里遇到一位无名老者时，我却比读这段《三国演义》还要激动。

还有下面的段落：

他觉得自己生命的价值就是种树，那边的棺材就是这价值结束时的归宿。

看完树，我们在村口道别，老人拄着拐，慢慢迈进他那个绿风荡荡的小院。我不知怎么一下又想到那具棺材，不觉鼻子一酸，也许老人进去就再不出来。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在病床上还批阅文件，作为科学家的华罗庚在讲台上与世人告别，作为一个山野老农，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
大概编者认为学生年纪太小不必说到“死”，所以植树老人、周恩来、华罗庚一直工作到死的镜头都统统删掉了。其实大可不必，我们不是照样宣传黄继光、邱少云等烈士吗？对学生进行一点人生观、生死观的教育，正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。从行文上说，这么一删，后面的结论：“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样东西，真正与山川共存，与日月同辉了。青山是不会老的。”倒显得有点突兀。建议教师讲课时还是阐明这个本意。

这篇文章经过从新闻到文学再到课文的嬗变，已经走过了38年，现在还在使用。它已经超过了我的另一篇课文，服务了36年而“退役”的《晋祠》。虽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但还是有深层原因的，这与文章对生态的关注、对无名的普通劳动者的关注有关。我近年来仍然关注生态与自然，又开辟了人文森林学的写作，出版了《树梢上的中国》，里面有更多人与树的故事，可作为这篇课文的教学参考。比如《左公柳》一篇，里面就有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，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，那可是真人真事，比《三国演义》还感人。

“文学考古”有何创作“秘诀”？

马伯庸：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

本报记者蔡馨逸

“夏四月，以南京地屡震，命往居守。五月庚辰，仁宗不豫，玺书召还。六月辛丑，还至良乡，受遗诏，入宫发丧。”《明史》用短短三句，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片段。而文字背后的历史，又是怎样的波谲云诡？

在新书《两京十五日》中，马伯庸切入《明史》中的真实记载，将无数细节填入历史的缝隙，创作出一场扣人心弦的千里奔袭：明朝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，太子朱瞻基刚到南京便遭人暗算，惊魂未定之际北京传来消息，皇帝病危，一时间南京、北京暗流涌动。为了力挽狂澜继承大统，需要尽快赶回北京的朱瞻基选择沿大运河北上。一路上各方势力角逐厮杀，朱瞻基等人险象环生。在这场奔逃中，明代大运河沿岸的风物画卷也缓缓展开。

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写小说，到后来出版作品，并斩获“银河奖”、人民文学散文奖、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，马伯庸的创作一直是不拘一格、天马行空的，涵盖科幻、武侠、推理、历史等众多类型，因此有了“文字鬼才”的称号。

他的历史悬疑小说，如《风起陇西》《三国机密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以及《两京十五日》等，以扎实的历史考据、丰富的想象力、严密的逻辑和幽默的文风被众多读者喜欢，也被认为是最能展现马伯庸风格的一种类型。

有读者将这一类型命名为“考据型悬疑文学”或是“文学考古”。而在马伯庸心中，他是以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为原则，利用既有的考古和历史资料，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社会规则，进而创作一种历史的侧写。

找到一个好故事，让读者领略大运河的魅力所在

草地：新作《两京十五日》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？

马伯庸：我一直很喜欢京杭大运河，想为它写点东西，但这是一件难度很高的工作。大运河绵延数千里，沿途几十座城市，前身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，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，跨度都非常大。这样一个宏大的造物，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去承载它，才能让读者领略到大运河的魅力所在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一段明史资料，讲明宣宗朱瞻基当太子时出巡南京，洪熙皇帝在北京突然死亡，他必须从南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去继位。这恰好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切入点，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部小说。

草地：《明史》中关于朱瞻基从北京到南京再返回的记载只有这寥寥数语，但《两京十五日》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悬疑情节，还展现出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。您是如何构思的？

马伯庸：我一直认为，要写好历史故事，就必须要把读者带入到独一无二的时代氛围中去。虽然都是古代，但汉与唐的氛围是不同的，唐与宋的氛围也是不同的，要写出每一个时代特点，就必须对那个时代上至社会规则下至衣食住行都做深入研究。为了写这部小说，我啃了大量明代的专业研究书籍、学术论文、考古报告，差不多能装满一书柜；同时也去做了实地调研，沿着大运河的几个重要节点考察了一圈。当一个人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，见识了足够多的风景，自然便会有故事可以讲，有情绪可以抒发。所以写这部小说的过程，其实也是一段难能可贵的学习经历。

草地：创作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？

马伯庸：这部小说的发生舞台是南京、北京和京杭大运河——严格来说是江北段京杭大运河——为了体现当时的市井风貌，我希望让每一个城市的口音都略微有点当地特色，与其他城市有所区别。明代的口音，几乎不可考，所以我只好参考现代方言，找了南京、扬州、淮安、济南、临清等地的朋友请教。结果我发现方言里最易学的部分是脏话，而最具特色的也是脏话，放在书中人物的语言里，效果斐然。写完这部书以后，我方言没掌握多少，天南地北的脏话倒学了一大堆，可惜没什么发挥的场合。

草地：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两京十五日》等小说都是将大量的历史信息浓缩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这是一种写作策略，还是一种历史观？

马伯庸：我是个急性子，日常行程都是按小时来分割的，一旦迟到或延长，就有种隐隐的不安感。只有确信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既定安排在迅速进行，心里才能踏实。所以与其说限时写作是一种策略或历史观，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“心理疾病”的体现。

草地：《两京十五日》出版已近半年，不少读者在网上分享了读后感，其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？

马伯庸：这部小说开头十章发生在南京，为此我去了很多次南京考察。小说出版之后，有一个读者发来书评，说她是学古建筑的，看到小说里有一段情节是主角被追到南京的城墙上，走投无路，因为城墙高六丈五尺，跳下去就会摔死。她职业病发作，想知道“六丈五尺”这个数字到底是有所根据还是信手一写，便去查了一下考古报告，发现南京明代城墙最高是21米，换算下来正好是“六丈五尺”。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到网上，我老老实实承认说：“这没什么神奇的，我和你查的是同一篇考古报告而已。”

其实五丈六尺和六丈五尺，对剧情来说没有本质区别。不过我花了心思埋下小彩蛋，能够被人发现，还是挺高兴的。

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

草地：您对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是怎么培养起来的？

马伯庸：我的兴趣是从阅读历史文学作品开始，国内的比如姚雪垠、徐兴业、高阳、二月河，国外的如司马辽太郎、茨威格、司各特、赫尔曼·沃克等，从小到大看了很多。我很喜欢观察历史在文学中的演绎，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，看作者是如何巧妙地运用想象，把虚构镶嵌进史实的缝隙内。在我看来，这简直就是一门艺术。

草地：在创作上是否受到某位作家的影响？

马伯庸：如果说最直接的影响，日本的隆庆一郎、法国的克里斯蒂安·贾克和英国的弗·福赛斯则从技术上给我指引了创作方向；二月河与徐兴业则用他们的作品告诉我，中国历史的魅力所在。

草地：历史题材小说对当下有怎样的价值？

马伯庸：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，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主题表达，一定是与当下的价值观息息相关的。从最本质上来说，我们去书写古人，去演绎过往，其实是在寻找旧日与当下可以共鸣的点。比如对曹操的评价，从古至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明清时代的人依循儒家道德观，对其评价很低，《三国演义》和其他文艺作品里他就是个白脸奸臣；而更尊重个性表达的现代人，对这位豁达多疑、狡诈开明、兼具枭雄与艺术家气质的矛盾人物充满喜爱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代作者关于曹操的种种作品，形象与从前大相径庭。

草地：您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，同时又有脑洞大开的情节。您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？

马伯庸：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。我的原则是不去改变历史，历史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但在细处我们可以发挥想象，为既定的历史事件寻找一种全新的解释。这种解释不一定是符合历史的，但一定是符合历史逻辑的。

草地：您认为应如何阅读历史？

马伯庸：别太严肃，但也别太不严肃。以兴趣入门，以毅力钻研，以情怀发酵，如此而已。

“写作就是一种率性而为，算计太多就失去意义了”

草地：您从事写作20多年，兴趣点、写作风格有哪些变与不变？

马伯庸：最开始我什么题材都写，任意妄为，不加限制，文字风格也在各种模仿中反复跳跃。不过现在我稍微收敛了一下，集中在历史题材的创作方向。不过我也没有说一定只在这个领域发展，闲来无事也会写点其他的换换口味。归根到底，写作就是一种率性而为，算计太多就失去意义了。

草地：可以说您是网络文学的初代创作者。在您看来，网络文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？

马伯庸：网络文学从初期的野蛮生长、草根蔓延，已经进化到了一门专业、精细的创作类别。它有着独特的文学形式和创作规律与技巧，甚至于审美体系与评价标准都与传统迥异。很高兴的是，现在学界终于开始正视这种文学现象，并试图从学术角度去归纳、总结。

草地：目前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超百亿元，吸引了不少人加入网络文学创作行列。对于这些新人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马伯庸：我的建议只有两个。第一：无论写得多不成功，至少写完一部小说。我见过太多人写了很多散碎的开头或片段，却很少有勇气完成它。事实上，小说写作比拼的是意志力，咬着牙完成一部完整作品，你就体验了一次创作的全过程，看到的风景和随便写写截然不同。第二个建议，先找份糊口的工作，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，否则很容易陷入生存焦虑。文章憎命达，但不是所有的命苦都会转化为文学。

草地：能否给我们推荐一本您最近在读的书？

马伯庸：最近看了一本《被统治的艺术——明代卫所与生存之道》。这是一本讲明代军户的书。军户制度我很熟悉，也读过很多相关的论文，但无可避免地，是从大量朝廷的档案文献中去理解，都是宏观概念。而这本书反其道而行之，在简单介绍了军户的大框架之后，直接下沉到了一个个地方上的小家族。作者很有巧思，也极有田野考察精神，他从许多件军户家谱、文艺作品、案牍等材料里寻找蛛丝马迹，利用有限的材料拼凑出普通军户的生活图景。从一件件散碎不全的记录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军户们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种种场景与互动。